

新旗

第九期

半月刊 實售國幣三百元

我們要的國民大會

是甚麼？

舒嚴

國民大會開會日期快到了，當政的國民黨表示決不再延期，在野的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則表示不願參加這個國民大會，因為召集命令違反了政協決議，而內戰槍聲至今尚未停止。國民黨是否能因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底反對而改變他的決心呢？即數日之內是否能頒佈命令又加一次展延會期呢？我們不知道。

我們要說的是：我們不僅反對十一月十二日召開的那種國民大會。即使內戰停止了，即使國民黨政府依照政協決議召集了，即使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參加了，——這種國民大會，我們也是反對的。因為這種國民大會仍然是十年前國民黨一手包辦的舊代表和現在各黨派協商分配和指定的新代表所組成的。如此產生的代表都非中國民眾自由選出的，都不能代表中國民眾利益。

我們要求停止召集這種國民大會。我們要求重新制定國民大會選舉法，依照普遍，直接，無記名原則，讓民眾自由選舉代表，成立一個全權的國民大會，或制憲會議。

制憲會議應制定一部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過去的憲法草案，無論是以前原文或後來修正文，都應拋棄，而推選委員會重新起草。憲法制定之後應提付全國國民投票表決可否，經過了全民投票通過以後，才能成為正式的憲法。

制憲會議底任務不僅以制定憲法為限。一經宣布開會，制憲會議就應擁有國家最高權，不僅擁有立法權，而且擁有行政權和司法權。制憲會議應從國民黨區域政府和共產黨區域政府接受一切權力，

成立一個臨時的統一政府，對制憲會議負完全責任。臨時政府國防部應統一指揮全國所有正規軍以及輔助的武力。

未來政治的和經濟的制度，完全由制憲會議決定，決定以前，即正式憲法頒布以前，一切都保有臨時的性質。

總之，我們所要的國民大會，乃是法國大革命時的『國約會議』(Convention Nationale)，自有歷史以來最民主的最有權力的國民大會。我們所要的，并非烏托邦，而是歷史上曾經實現的，現在又有實現可能的一種制度。

現在有實現可能麼？現在中國還能實行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中最典型的制度麼？

全然可能的，但非必然的。一切視我們為之努力的程度而定。首先，我們努力爭取最民主的選舉法；其次，我們努力保障最合法的選舉；其次，我

第九期目錄

- 我們要的國民大會是甚麼？..... 舒嚴
- 我們看華萊士事件..... 劉默
- 再論內戰擴大以後..... 振聲
- 工會人員的安全問題..... 蕭振華
- 收回港九問題..... 三男
- 新民主主義和舊民主主義..... 穆德
- 美國社會主義工黨對中國內戰的態度..... 鶯鶯
- 歐洲革命之第一階段(上)..... Ericat Gernain
- 評胡繩「論發展生產力」(讀者論壇)..... 守敬
- 再論中國共產黨底革命觀..... 穆德
- 青年人的兩大問題(讀者通信)..... 朱醒石
- 中國革命悲劇(續)..... Harold R. Isaacs
- 電話公司怠工事件(工廠通信)..... 覺新

發行者 新旗社
 通訊處 香港西灣河
 太古船塢李振聲

們努力選舉最能代表廣大民衆利益的代表；其次，我們努力提出最符合廣大民衆利益的綱領；其次，我們努力……，——但這一切努力能否成功，全視廣大民衆，尤其負領導責任的工人階級，是否崛起，是否以議會外的民衆力量去支持議會內的代表人爲定。廣大民衆崛起，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爲自己利益而鬥爭，不僅可以實現資產階級革命中最革命的議會制度，而且能使這個制度爲無產階級革命服務了。

我們看華萊士事件 劉默

華萊士事件構成了九月中旬國際政治消息的主題，事情很新鮮，毋須我們在此地覆述。這事件在國際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尤其在中國，更尤其在中國的民主派人士及其刊物上，引起了甚大的注意與興趣。這是當然的，因爲華萊士正是美國式的民主派，他反對獨占的『官僚資本』，他主張持久的和平，他主張與蘇聯妥協，希望有各黨派參加的中國的政府出現。……

人們慣常指出：華萊士是代表美國中小規模的自由企業家的利益與見解的。這話不無根據。美國的中小企業家確實是受着嚴重壓迫的，他們確實反對獨占資本，進而反對他在國內國外的政策。但是我們知道，傳統的美國的自由企業家們，首先在經濟上，跟着在政治上，愈來愈失去其比重與地位了。尤其是經過了這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自由企業家』竟可以說是一蹶不振了。根據『較小戰時工廠聯合會』向美國『參院小企業委員會』提出的報告：『第二次大戰期間的經濟集中』一書所載，經過了這次戰爭之後，美國的全部經濟命脈，是由五大財團控制了，牠們間接直接所屬的二百五十個

大公司，擁有了全美今日所有的三分之二的生產資料。至於小規模的經商與製造商行，則有五十萬家在這戰爭期間被完全消滅了。

獨占資本如此地得了戰爭之賜，真已到達了凌駕一切的地步，今日美國是由牠操縱着政治，壟斷着經濟，指揮着輿論，總之，是牠掌握着美國的整個命運。

在這次戰爭之前，美國的獨占資本就已達到了這個地步，非以全世界爲其市場不足以繼續其存在了。如今，戰爭使美國的工業生產又增加了一倍，那就更非使天下成爲美國的『一家』不可。這是美國目前世界政策的由來。但要貫徹這個政策，就得積極地準備戰爭，甚至從事戰爭，而戰爭却首先要使勞動者與中等階級的人士受災。這些人，剛才從長期的戰爭壓迫中出來，那是不願意立即又被拉入這個可怕的災難中去的。所以他們反對獨占資本的政策；但直到現在，美國的工人階級還沒有一個強大與獨立的黨，不能將平民大眾的反對聲浪，組織成一個獨立的力量，去和獨占資本的政策對抗。於是資產階級內部某些較有遠見與比較敏感的政治家，便出來『代表』大眾的利益了，以便取得他們的擁護，他們的同情，藉以緩和工人階級與廣大小資產階級對獨占資本的敵視，防止他們獨立組織的出現，使這些不滿仍舊導納到獨占資本的政治軌轍中去。

對於華萊士，伊克斯，毛根索等人的『民主表示』，應該首先作如是觀。

因此，我們覺得，美國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中國的老百姓，或蘇聯的工人們，都不應該誠心誠意相信華萊士等所代表的是一個完全和美國現行政策，即和獨占資本的政策相反的路線，是『民主的』『和平的』，或什麼『羅斯福的』。我們要記得

美國的獨占資本是在羅斯福的長期統治之下特別發達起來的，美國的戰爭是羅斯福領導的，美國的對蘇與對華政策，也是羅斯福所規定的！華萊士之反對獨占資本，也祇能和羅斯福的反對托拉斯一樣；以反對之名行保育之實。

如果華萊士這次以左傾姿態，獲得了美國工人與小資產階級的支持，贏取了今年冬季的議會選舉，且能當選爲一九四八年的美國總統，那末美國的政策在本質上決不會改變。未來的華萊士和今日的杜魯門一樣，也祇能執行由華爾街交來的政策吧了。再說想得太胆一點，如果華萊士退出民主黨，會同了美國現成的幾個大的改良主義工會組織起美國式的工黨來，那末，華萊士做了美國的麥唐納或阿德里，即使掌握了政權，也祇能和目前的英國工黨一樣，忠實地執行着華爾街那些『陛下們』的聖諭。

因此，如果不是美國工人階級在一個真正革命的工人政黨的領導之下，實行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從根剷了獨占資本的勢力，則美國的國內外政策決不會有根本改變，換句話說，一定要走向新的更慘酷的世界大戰的。這政策由貝爾納斯或華萊士來執行，不過是步驟與策略上容有不同吧了。

蘇聯的報章與廣播，這次對華萊士事件沒有表示多大的興趣，倒是對的。

中國的民主派，尤其是中國進步的工人，也不該對華萊士及其一派存着奢望。美國統治階級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改變華爾街獨占資本所定下的政策的。在今日美國內部的各個力量中，祇有美國強大的工人階級，當他們政治上覺醒，組織上獨立，進行社會革命，建立工農政府之後，才能給中國以真正幫助的。在這以前，也祇有這個階級的獨立行動，才能阻止美帝國主義的干涉中國，進攻蘇聯。

我們祇能對美國的工人階級伸訴，我們也祇能寄託希望於美國工人階級的革命行動。取捨於華萊士與貝爾納斯之間，結果也會如依達於馬歇爾與赫爾利之間一樣的。

再論內戰擴大以後 振聲

本刊第七期上，我們談過這個問題，那次主要是對中共而言的。我們認為中共所代表的那個農民的武裝力量，如果想像得把統治者所加於軸身上的鎮壓，想在這內戰中勝利，中共領導者必須拋棄一切幻想的或妥協的政策與立場，必須站在正確的土庫革命與社會革命的政綱上，為全權普選的國民大會而鬥爭。

經歷如此深刻的機會主義墮落的中共領導者是否能夠這樣做，我們是懷疑的；不過即使退一步，假定他們能夠這樣做，但事情也還祇做了一半，因為更重要的一半，需要靠大城市中的民衆——尤其是其中的工人階級來完成的。我們現在就要談到這一半。

現在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國人都反對內戰，但是內戰像天災，像瘟疫，像死亡一樣，終於違反着我們的意志而來了。來了怎麼辦呢？一向來高叫反內戰的聲音却聽不見了。這裏自然是因為國民黨的反動壓迫，牠用特務的魔手緊緊縛住了人們的手，握住了人們的咽喉。但顯然也不能把全部責任放在特務壓迫上，反內戰人士本身的軟弱與妥協，却要負大半責任的。

我們拿上海來做例。

上海的反內戰爭和平的運動，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大示威中達到了很高表現。這次運動，我們知道是由五十三個團體發動的，其中包含着學生團體，

產業工會，職業公會以及自由職業者的社團。當時被南京戲劇式的政治談判所刺激，人民反內戰爭和平的迫切要求，就匯合成這一次大規模的示威。我們當時就竭力指出這次運動的大意義，同時我們更指出，爲使這運動不致如蒸氣似地飛散，我們主張由參加運動的羣衆團體，依照人數比例，推選代表，組織一個超黨派的，統一的，集中而民主的機關，由牠來領導一切反內戰爭民主的鬥爭。

我們這呼聲，可惜在佔據領導地位的民主派中沒有得到響應。

不錯，上海目前有一個『人民團體聯合會』，但這與我們所要求的組織不同。目前這個聯合會是一個鬆散的，僅限於少數上層份子聯合的團體，牠不是直接由羣衆選舉的，不能獲得廣大羣衆的信仰，因之不能具有戰鬥性。因爲要使一個組織具有力量，牠必須是直接由羣衆中來，對羣衆負責，在羣衆眼中活動的。目前那個聯合會自然根本談不到這樣的性格。

從六二三的運動中沒有產生出一個羣衆性的戰鬥組織來，這是近幾時上海反內戰運動消沉的一大原因。因爲沒有這樣的組織，又因爲現有的『聯合會』是上層聯絡而鬆散無力的，所以代表們一到南京，特務們一對各團體的負責人來了一個恫嚇，有些先生們便急急忙忙後退了，縮起來了。反動派完成了各個擊破的戰略。

其次，民主派領袖們的妥協與胆怯行爲，使羣衆失了望。舉個例子，就像林漢達先生，他在學生羣衆中是有很大影響的，反動派注意了他，給他加上了『馬路政客』的帽子，準備給他以打擊。六二三示威中，林先生被舉爲主席團之一，在羣衆抓到了特務分子，預備打他們的時候，林先生出來勸解了，可是事後，反動黨却誣陷他指揮打人，放出空氣

來說要通緝他。這當然不過是空氣吧了，嚇唬一下而已。林先生應該挺身而出，向社會聲明真相，準備接受特務的挑釁，如果這樣幹，特務就會退却，甚至會出來解釋『誤會』的，萬一他們不顧一切，竟敢將林漢達先生誣謬，或判處數月徒刑，那末這結果將不是鎮壓反戰運動，反而會激起更大的民主怒潮來的。可惜，我們的林漢達先生不會這樣鬥爭，他躲起來了。

下關被打的代表們，當時便聲明不願追究，結果，靜悄悄地回來了，打手們都綏了刑，沒有事；指使打手的大人們更是沒有事；可是歡送代表的糾察却被判了罪，無辜地在獄中受難。羣衆懷疑我們的示威有什麼力量，他們再不會在這些代表們的號召之下起來了。

昆明的暗殺確曾激起了廣大羣衆的憤慨，人們都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來表示一下自己的反抗，但是直至現在（九月二十日），連一個追悼會都還不曾開，要求公開審判兇手的運動不再繼續，昆明飛來的教授們都不敢開口了。

上海的工會，自從七月以來，就遭受着各方面的壓迫，勞協也受了打擊。在這打擊之下，領袖們很多屈服了，非但不領導工友們從事反攻，却拚命叫工人『識相』，竭力阻止鬥爭。

民主派的領袖們似乎都只能『看風頭』的。把民主鬥爭的全部希望寄託在國民黨的『讓步』，馬歇爾的『壓力』，共產黨的鬥爭之上。一到國民黨決不讓步，馬歇爾支持內戰，共產黨武力見拙的時候，他們便都一個個退進書齋或辦公室了。這是大大地不對的。

首先該相信自己的力量呀！

大城市中民衆的政治鬥爭是具有決定力量的。不要讓國民黨，馬歇爾或共產黨的態度來決定我們

的態度，却要用我們的鬥爭來決定前三者的態度。真正反對內戰與爭取和平的城市民衆，絕對不該以內戰之業已擴大而消極，而失望。應該以內戰之擴大而加緊我們的努力。第一步，必須加強我們之組織，要產生出民主選舉的直接代表廣大羣衆——尤其是勞工大眾的組織，要用直接行動，例如罷工，罷課，罷市，以及示威遊行的方法，來發揮我們的力量，表示我們對內戰的抗議。

祇有這樣，我們才能喚起美國反戰羣衆的注意，獲得他們的援助。祇有這樣，我們才能使國民黨中的好戰者有所顧忌，使軍隊中的厭戰士兵積極地起來反戰；祇有這樣，才能使共產黨率領的農民武力不致被消滅，且能在城市工人階級及其正確政黨的領導之下，真正完成中國的民主改造。

民主派的領袖們如果能領導我們這樣幹，好的，我們一起前進；如果他們始終保持着妥協與胆怯的態度，那末丟開他們，讓我們下層羣衆自己來。

九月二十日

工會人員的安全問題

蕭振華

統治階級的眼睛真亮，而且也真有經驗，爲要壓迫上海剛剛拾起頭來的民衆運動，他們把頭一顆子彈射向我們工人的工會。工會到處被改組，比較敢替我們工人利益說幾句話在工會裏辦事情的工友，時常被人捉去。最有名的，就像電話公司的二位工友，綢廠方面的三位職工，百貨業工會的副理事長，其他還有許多不出名的工會人員被無緣無故捉去關起來。捉了去關在監獄裏，並不送法院審問，一關幾個月，全不講什麼法律。弄到正派的工友都不敢出來過問工會事情了，有些工友還担任着工

會職司的，也不敢作什麼主張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都勸工友忍耐，等等風頭再說。

這樣一來，資本家胆子大起來了。他們開始反攻，很多廠家提出減工錢，裁人，不把工會放在心上。工人簡直不能講話，一有話，帽子套在頭上，『護工隊』把你弄了去。幾個月來，物價漲了又漲，可是我們的工錢非但沒有加，而且減了。照理說，工錢跟着生活指數，物價漲了工錢也跟着漲，可是天曉得，四個月之前我們還過得去，有幾個工友還能打只金戒指帶帶的，這兩個月拿來的工錢，却連一個人的吃用都不够了。拿我來說吧，我的底薪是一元一角錢一天，四個月前，乘了下了生活指數（多少我弄不清）我拿到十四萬多些，日子很好過；這個月，工錢算出來，十五萬光景，我却過不下去了。什麼道理呢？上次請教了人，他告訴我說，生活指數靠不住，據說這是市政府關了門自說自話編出來的，還聽說管這門事情的一個專家因爲良心過不去而辭職了。

難怪，市政府跟資本家唱雙簧，一個瞎造生活指數，一個減低底薪，再來個特務先生亂捉工會負責人，我們工人倒罷了。可是，前兩天，看見報紙上登載吳國楨老爺又在參議會上說：『上海工人拿的工錢比美國工人拿的多』，這真不知仁愛忠信的『信』字，禮讓廉恥的『恥』字是怎樣講的？

總之，我們工人現在又被打擊得拾不起頭來了，一年來的鬥爭結果，快給人家搶光了，我們又將陷入敵偽時代的痛苦中了，甚至更痛苦都不是不可能的。我們要立刻覺醒轉來，睜開眼睛，不要馬馬虎虎。要爲我們的生活改善而鬥爭，這個鬥爭中的第一步，就是要大家團結起來，作工會人員，或工人代表的後盾，要用我們全體的力量來保證他們的安全。今天起，就應該發起一個運動，把目前全上

海關在牢監裏的工會同志救出來；以後，再碰到同樣情形，一定要用『全體進牢監』，示威遊行，甚至不惜用罷工手段來反對拘捕工人。

工會人員的安全有保證，工會的事情辦起來才有勁，我們的鬥爭才有辦法，我們的生活才能改善，否則，一切都談不上的。

收回港九問題

三男

最近因爲香港政府的發言人否認九龍城內仍爲中國領土，引起了好些人的抗議。見之於報章的，有大公報的社評，外交部司長的談話，……而更鄭重的，則是上海參議會的正式決議，『請政府積極進行收回香港九龍澳門』，而且還要『收回蒙藏的失土』。

這事情有點叫人想起今年春天的『白爾丁事件』。正當人民對政府爭取民主的時候，忽然有人出來提醒大家：法國人不願治外法權的取消，竟私將人犯裝走了，於是遊行，於是抗議，於是人心激昂。

我們並非不看重中國的法權，當然我們更看重中國的領土，但是，正當中國的整個主權在送人，全部領土在請人佔領的時候，特別指出另一較小強人的蠻橫與侵犯來轉移人們的眼光，我們覺得是不當的。捉住蒼蠅放過老虎的辦法，縱然不是陰謀，也至少是糊塗吧。

但我們却不相信我們的當局會糊塗的。

『勝利』一年了，不平等條約的『取消』有好幾年了，但是，海關還在客卿手中（只是英人換了美人），內河還有外輪行駛，而且，空中是美國的飛機，街上是美國的大兵，滿地是美國的車輛，滿市是美國的貨物，最高『主席』有馬歇爾元帥，各

部各機關有美國顧問，殺人用的是美國槍炮，「陸路」的是美國軍隊，搜捕有美國的憲兵，審問有美國的法庭，但是，我們祇聽見大人先生的歌功頌德，沒看見他們的一點抗議，半分批評。這裏對他們是無關乎主權與領土的了！

在此情形中談收回港九，我們只能覺得無聊，甚至可恥。大公報的主筆先生從這個「港九收回運動」中看出了「民族主義」，倒是十分清楚地暴露了今天中國統治者的民族主義的面貌。

其實，即使「港九」也只是陪襯吧了，一位姓莊的參議員主張「出兵」去收回蒙古失土，倒是十分真實的；因為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祇有恰好充當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先鋒角色的時候，才是真實的呀。

新民主主義和舊民主主義

穆德

周恩來近日來上海向聯合社訪員發表談話，其中有幾句說：『此項和平（按指停戰及成立聯合政府）之唯一結果，即使中國實現美國式或林肯式的民主政治。』

胡繩幾個月前在「論發展生產力」文中說：『成立聯合政府，其任務歸根到底就在於：（一）解放農民，……（二）發展自由資本主義。……』可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新民主主義政治并非歐美式的舊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經濟亦非歐美式的資本主義。

我在本刊第五期「革命問題漫談」中曾預告將說明毛澤東所謂新民主主義，其實就是資本主義，也就是舊民主主義。這一預告至今尚未踐行。好了，現在無庸我多說明了。周恩來已經承認新民主主義就是美國式的或林肯式的舊民主主義，而胡繩也已經承認新民主主義就是自由資本主義了。

由此可見，要在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選擇一條中間道路，總是徒勞無功的。凡理論上排斥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即使是暫時的排拒，即使是拿來放在最高黨綱裏面，都必然在實踐上站在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方面。

美國社會主義工黨對中國

國內戰的態度

鶯

美國社會主義工黨，美國工人階級中一個最革命的政黨，是美國一些站在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立場上的革命家組織，也就是美國的托洛茨基派；這個黨，對於美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戰，有一個極正確的態度。在牠的機關報「戰士」上，不斷有文章揭發本國帝國主義者的陰謀，同時反對國民黨鎮壓革命民衆的行爲。下面譯的是六月二十九日該報的一篇社評，由此可見美國托派對我們內戰的態度：

『據合衆社稱，六月廿三日，上海有十萬人的大示威，反對美國的干涉中國，示威者高持標語，上書「美國軍隊，請回到你們的可愛之家去！」「打倒金元外交！」「美國人，不要參加中國的內戰！」等等。講演者以英語和中國語大聲地呼喊，要求美國的海陸空軍立刻從中國撤退。』

『從這示威中，使人再度注意到華爾街征服中國的計劃。戰勝日本之後，美國非但不撤兵，且更深入地將軍隊發進這個混亂的國家去。這些軍隊成爲蔣介石政制的支柱。』

『除了美國的軍隊外，華盛頓又送轟炸機給蔣介石，美國的運輸艦運送蔣介石的兵到東北去，而

不把美國的自己的兵運送回來。那些被美國的運輸艦運上東北的蔣系軍隊都是美式配備的。并且美國的軍官在蔣介石的參謀部工作，改編中國軍隊以適應近代機械化的戰爭機構。華爾街最後希望利用那些軍隊作爲第三次大戰的幫兇。』

『華盛頓之干涉中國是違反了中國人的意志，最近的示威是以後連續不斷的示威運動的開端。中國人希望蔣介石獨裁中解放出來。他們需要和平。他們要求機會可以把中國從目前的悲慘，飢餓，流血中得救。』

『華盛頓之干涉也是違反美國人民的意志，違反海外的兵士和他們家屬的回國要求。關於撤兵問題，人們對國會施了這樣大的壓力，所以政府長官們一再地給人家諾言。甚至確定的撤兵日期都定出來了，但每一個諾言都沒有遵守。』

『假使華爾街一意孤行，那麼中國的前途非但不是「免除威脅的自由」，大西洋憲章上一切規定的自由都將被撕毀了。唯一的前途是呻吟在美帝國主義的鐵蹄下。』

『美國的勞工運動必須對國會加重壓力。將我們的手伸過大洋去！和上海的示威者聯合起來！撤退在外國領土上的美國軍隊！』

本刊第八期 正誤

4頁下欄十六行「新民主主義論」應改「新民主主義論」

6頁上欄十二行「二五減租」應改「二五繳租」

全頁全欄十三行「一百九十五斤」應改「一百三十斤」

全頁全欄十四行「二百十斤」應改「一百四十斤」

全頁全欄十五行「二百二十五斤」應改「一百五十斤」

全世界托派組織，大戰中相互間雖然失去了聯繫，但製定的一種路線是不謀而合的，即都是預言着：將有世界的革命興起，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果和產物。這個路線是建立在若干理由之上的，而這些理由又是從那腐朽的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社會、心理各方面發展之內在法則推演出來的。這些理由同時也構成了第四國際綱領底基本項目，又為第四國際所以存在的原因。拿實際發生的事變來證驗這些理由，遂成為整個運動之重要任務了。

戰爭為甚麼非在革命暴動中完結不可呢？

我們的推測可以概括如下：帝國主義戰爭持續下去將加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切矛盾。羣衆生活將一天比一天更加困乏，無產階級革命潛力亦將一天比一天更加活躍。最後，在許多的國家，戰爭將削弱或破壞國家機構，使勞動階級能够把階級鬥爭推展至其最前進的階段，即雙權政制階段。帝國主義的均勢完全打破之後，所有這些因素配合起來，就能造成良好的條件以擴大革命鬥爭至於歐洲範圍，甚至世界範圍了。

應用於歐洲的具體條件，用具體的話說來，這個推測就是說：舊大陸的羣衆將一天比一天更加不能負擔戰爭重壓了。羣衆底鬥爭意志，會於一九三九—四〇年間降落到最低的水平，以後就要開始上昇，而且愈來愈迅速地表現出來了。

在德國軍隊佔領聲中，歐洲各國舊的國家機構一個個可恥地崩塌了。其中餘剩的部分，事實證明，再不能抑制羣衆底運動了。納粹軍事機構和警察機構固然造成了銅堤制止歐洲無產階級底革命暴動。可是到了納粹機構削弱和崩潰之時，革命暴動就要接二連三起來了。最後，德國革命底爆發將結合各國底暴動，使之成為歐洲的規模，使之互相協調，而且給予革命過程中產生的雙權政制機關以可能，鞏固其力量，在長久時期內，抵抗英美帝國主義底壓力。這個時期又將特別有利於第四國際各國支部迅速發展的。

這個推測合於事實麼？

試簡略檢查一下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以來歐洲發生的事變，我們就可看出上面的推測有那幾部分是經過事實證實了的，又有那幾部分是顯然不合事實的。沒有人能否認，由於可怕的戰爭底消耗和破壞，歐洲經濟業已完全枯乾了。戰

爭停止之後一年，歐洲重工業生產不及戰前生產之半數。也沒有人能否認，戰爭強加於羣衆的不可忍受的生活條件畢竟復活了羣衆底戰鬥潛力。試研究一下罷工鬥爭底次數，我們看見，一九三九年時，各國罷工很少，那些已受法西斯統治的國家，常常終年沒有一次罷工，可是到一九四三年初，歐洲一切國家忽然都罷起工來了。同戰前時期比較，此次罷工潮發展的很快，到了一九四五年，除法國以外，各國都超過了上次一九三六年罷工潮底水平。（此外，此次罷工潮，就世界範圍說，還是在向上漲的，同整個革命潮一般，但這方面姑丟開不說。）

當納粹佔領期間，蓋世太保機構尚在威風凜凜時候，已經有好多羣衆行動發生了。其中含有希臘和意大利的四次總罷工，法國反對徵工運動，遊擊隊佔據南斯拉夫，以及比利時國內幾次大罷工和里埃治城成立工廠委員會等等。所有這些，與一九三九—四〇年時無產階級普遍消極成了顯明的對照；同時，又證明了這些乃是革命的運動，并非第一次大戰後戰勝國內發生的一連串經濟罷工性質，後面我們就要說到，在好多國家，這些事變結果都造成雙權政制機構或其胚胎形式。

歐洲革命之第一階段（上）

Ernest Germain

所以第四國際底推測和實際發生的羣衆革命行動之間，所不符合的僅僅在於規模較小，沒有同時發生的。又缺少協調而已。我們已經看見了歐洲範圍的革命潮，但進行得沒有我們預料的那麼快，又比我們預料的更少規則些。最重要的，是沒有德國革命發生，因此我們的中心預言之二似乎沒有應驗了的。

第一階段下的雙權政制

雙權政制在意大利達到其最完成的形態。一九四三年七月間，意大利開始革命時，好多地方成立了工人代表會，米蘭甚至成立了一個工兵代表會。以後，各工廠成立了「內部委員會」，而全國城市和鄉村又有無量數的「國民解放委員會」產生。在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天，意大利遊擊隊大規模武裝起來。最後，一九四五年四月末，發生了一次真正的暴動，結果是意大利北部所有工廠都給工人委員會佔領了，社會生活完全受遊擊隊統治，革命法庭組織起來，所有政治職能都歸「國民解放委員會」行使。（參看倫敦「經濟學家」雜誌，一九四五年五月六日。）英國資產階級的「泰晤士報」通信員比某些幻滅了的左派更瞭解這些事變底性質，他稱之為「社會革命」。

在捷克，一九四五年五月革命中也發生了同樣事情。那裏，雙權政制含有四種重要因素：一、工人代表會管理工廠；二、工人自衛軍；三、解放委員會為具有最高權的政治機關；四、人民法庭。一個資產階級記者（倫敦「經濟學家」記者）把這局勢寫得很生動，他又添加一個正確的觀察，說：「中央政府事實上毫無權力，工人自動沒收一切工廠。」

在法蘭西，巴黎暴動把羣衆多多武裝起來，好多工廠被工人所佔領，其中多數成立了工人委員會。同樣現象也發生於南方諸城，如里昂、里莫治、都魯斯、佩爾雷；這些地方有一特點，即那些雙權政制機關，雖在萌芽形式，卻能繼續行使職權至幾個月長久。

在希臘，政治上受 EAM 領導的遊擊運動，未「解放」前就已統制着很廣大的地區了。「雙權政制」這裏表現得最清楚。「正式的」希臘政府設在開羅，有其軍事機構，有其行政權和司法權；但在希臘本國，則羣衆選舉的委員會、自衛軍、人民法庭，施行職權。當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公開的國內戰爭時，那些平行的即資產階級的機關，在雅典城內好多區域以及 EAM 管轄下好多地區，都被取消了，所有的權力（尤其司法權力）落入於民選的機關手中。

在南斯拉夫，遊擊運動一開始就帶着希臘那種性質；這裏，各種權力也是移轉於民選機關之手的。但後來，這些權力就受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所支配了。我們沒有充分的材料，不能決定此後羣衆自發的創意力能發生甚麼作用。

在波蘭，紅軍迫近時，工農羣衆中發生了一種革命運動，工人佔據工廠，農民奪取土地。此外，工人又完全管理了生產。

最後，在比利時，雙權政制，認真說，僅存在於軍事方面，結果發生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事變。但里埃治城工廠委員會代表了「解放」翌日之事實的政權機關，而一九四五年五月間羣衆自動逮捕「比奸」也表示了羣衆在那些範圍內的獨立行動；在平時條件之下，這些範圍內的事務本應歸資產階級國家機關處理的。

雙權政制果真存在麼？

歐洲第一個革命潮底無產階級性，在幾方面受人否認。人們首先否認代表革命的機關是真正的雙權政制機關。「國際」中極右派和極左派都把那些新的政治組織看做舊機構，即資產階級國家機構，之新的形式。有些人甚至走得那麼遠，把羣衆鬥爭過程中自發的軍事組織看做同帝國主義軍隊一樣。又有些人，則分析事變，不過是一種藉口來攻擊史大林「魔手」和「俄羅斯帝國主義」

，他們在那些羣衆革命鬥爭中祇曉得去尋覓「替俄羅斯帝國主義服務的契士林式組織陰謀」，以別於「替英美帝國主義服務的契士林式組織陰謀」。

納粹佔領期間羣衆鬥爭中創立的政權機關，人們否認牠具有革命性和無產階級性，人們所根據的理由，概括起來約有如下諸點：

一、那些「委員會」，就其種種形式說，都不是民選的機關，而是依照各黨派強弱為比例成立起來的。

二、這些「委員會」包含好多小資產階級分子，甚至資產階級分子。

三、這些「委員會」和「自衛軍」是受帝國主義或蘇維埃官僚金錢津貼的，或同時受兩方面津貼的。

這三點論據是我們所熟聞的。當西班牙革命時，極左派也會使用這些論據來否認西班牙事變之內戰性質，而僅僅視為「帝國主義戰爭底一個準備階段」。但這些論據，至少一、二兩點，也會為「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西班牙一個中間黨）所使用，來抵制托洛次基底批評。

「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諸領袖說道：「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和嘉泰隆自治政府之間是沒有根本差別的，因為自衛軍中央委員會也不是「民選的」，也含有小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又說道：「托洛次基圖謀拿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中蘇維埃和臨時政府之間的關係，去比較一九三六年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和嘉泰隆自治政府之間的關係，——這又是一實例，證明托洛次基固執應用俄國圖式於世界各地。」

事實上，所有這些理論，無論是中間派的或較派的，都證明了那些先生生來就看不見落門的，即使雨點落在他們的鼻子上，也是看不見的。

從歐洲第一個革命潮產生出來的政權機關，其真實的性質，從其來源看及從對於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立場看，都是很明白的。每個機關都是工人羣衆和小資產階級羣衆獨立創意的產物，至少其先鋒隊獨立創意的產物。在下層，當選舉領袖時候（不僅工廠委員會選舉，而且基本軍事組織和鄉村「解放委員會」選舉），這些機關底自發性質是到應明白顯露出來的。上層領導機關，則往往是委任的，而且是按照各黨派力量大小為比例來組成的，——這個事實簡單反映此運動領導機關之妥協派性質；史大林派和改良派領袖即使不完全取消雙權政制，至少也想限制牠。這並不是甚麼新的事情。在以往革命鬥爭底全部歷史中，我們看見同樣的傾向進行同樣的政策，達到同樣的結果。試讀托洛次基著的「俄國革命史」中論彼得格勒蘇維埃第一屆執行委員會的一章，其中就說起了冒險的和小資產階級分子混入那個執行委員會裏面；從那裏又可知道

實在說來，那個委員會也不是由下層蘇維埃選出的。研究了柏林第一個「工兵代表會」成分之後，你也許可見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居然能鑽入其中（例如可林·羅斯）。試研究俄德西諸國革命中已知的政權推移方式，你更可看見希特勒革命初期也會顯露同樣的反應形式。此外，試拿德國中間派希爾費定要「將蘇維埃納入魏瑪憲法中」的「深刻思想」去比較史大林派在法比意希諸國要「將遊擊隊納入正規軍中」的同樣策略，你就要看見在根本相同的條件下發生的同一政治面貌了。

最後，從歐洲第一個革命潮產生的人民機關之真正的雙權性質，根據英美帝國主義，蘇維埃官僚和「民族」資產階級對於牠們的態度看來，還更加明顯些。德國佔領軍剛一退出舞台，依英美帝國主義軍隊撐腰的傳統資產階級政權機關一出現，資產階級立刻就實行一個頑強的殘酷的鬥爭，爲了消滅羣衆所造成的政權機關。如果這些機關真是屬於「敵派資產階級」的，那麼爲甚麼不可以將牠們納入「資產階級秩序」機構之內呢？能够舉出其他的例來證明不同的「資產階級派系」間的衝突會引起像希臘那樣的國內戰爭麼？那種推論，開始否認一九四三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間歐洲事變之雙權政制，因之否認其社會革命性，結果必然要在分析歷史過程時事實上拋棄了階級準繩。資產階級如此氣憤攻擊和消滅那些從「抵抗運動」產生出來的政權機關，隨力量對比不同而用種種方法去對付牠們，從「暫時的」承認到公開的白色恐怖，——這個事實，最後分析起來，除了拿這些機關階級性，視之爲無產階級政權、蘇維埃及工人自衛軍之胚胎以外，是無法可以解釋的。

第一個革命潮之特性

然而拿一九四三—四五年事變與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事變相比較，立即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個革命潮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個革命潮之間有重大的差別。

首先，在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間，革命運動實在說僅限於東歐和中歐。西歐僅僅有無產階級經濟鬥爭底激烈化。但此次，則全歐洲資產階級政權都陷於動搖了。

在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間，革命潮是從革命中心大爆炸發出來：我們有俄國革命底勝利又有「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年間德國革命底幾次進退。此次，則俄國完全不成其爲革命鬥爭舞台了；德國無產階級又僅發揮了次等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革命鬥爭曲線起初是短促而急速上昇，到一九一九

年春天達到尖峯，以後是急速而延續下降，中間祇有一九二二三年很短期的新的上昇隔斷着。此次，革命鬥爭曲線則是以緩慢而遲疑的新的上昇開始的，中間被若干次搖擺或部分後退所隔斷，但其一運動的趨向是向上昇的。這個事實底重要性，是很明顯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運動，一開始就遭遇重大失敗，尤其在德國；現在的運動則相反：無產階級尚未出其全力投入戰場。所以，幾次的失敗都是暫時的，相對的，并不危害於事變往後的發展，而能由鬥爭進入較高階段來補償。

這個重要的差別并非僅僅從第一潮底限制性（俄國和德國無產階級沒有加入鬥爭）生出來的，牠也是，牠尤其是從工人運動全部過去史生出來。一九一八年，無產階級沒有經驗，一鼓作氣衝入革命鬥爭中，而遭嚴重的失敗。無產階級，一九一四年間被改良派出賣了，陷於暫時的頹喪，到了客觀局勢發展（資產階級國家機構削弱，生活條件惡化等等），造成必要的條件，遂展開了羣衆鬥爭。無產階級投入這些鬥爭，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意識，但缺乏革命經驗（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年間開展的革命潮大受此影響）。

當初，無產階級在德奧匈波捷南意及波羅的海沿岸諸國的鬥爭，含有爲社會主義鬥爭的形式；俄國革命底吸引力在這些鬥爭中佔據很重要的位置。改良派領袖自己也不得不顧及羣衆底社會主義熱情。工人運動內部的「爭論」雖然歸結於公開的反共產主義的恐怖，當初則是呈獻爲如下的形式：我們怎樣建立社會主義？立即開始建立好麼？祇要翻閱當時的報紙：就可知道這種思想方法浸染了羣衆自身。

他方面，革命鬥爭經驗之缺乏，又使得羣衆及其領袖共產黨人方面都在不斷地摸索行動方法，這些領袖是沒有適切領受「十月教訓」的。惟有在極希罕情形之下，而且經過好多苦難以後，羣衆運動才能採取雙權政制底最成熟的形式。

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以後的歐洲無產階級，則是經過了長時期失敗的。年紀較輕的幾輩人未曾受過社會主義教育。年紀較老的幾輩人則懷疑有革命可能。領導此次戰後第一個革命潮的羣衆組織，無論史大林派或改良派，都在盡其所能剷除社會主義革命意識之殘跡，熄滅堅決的革命意志之火花。「社會主義」這個字眼很少機會能出現於刊物中，於討論或演說裏面。羣衆僅僅僅希望而且不連貫的情形之下才意識到他們的鬥爭是含有客觀上反資本主義的革命的性質的。（未完）

唐盛譯自比利時出版的「工人鬥爭」

讀者
論壇

評胡繩『論發展生產力』

守敬

胡繩先生之為時髦的馬克斯主義理論家，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不僅談論唯物辯證法，更不斷在談論各種實際問題。本來唯物辯證法是和實際問題分不開的，我不但不反對唯物辯證論者談論實際問題，而且極力主張想把唯物辯證法的人必須就實際問題來把握。馬克斯是唯物辯證法的創立者，他的唯物辯證法的思想都滲透在各種具體問題的著作中。胡繩先生儘管把唯物辯證法的公式背得透熟，但是一遇着具體問題，總是弄得離開唯物辯證法。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胡先生的唯物辯證法是背公式學來的，不足為用，同時更可能是因為胡先生遇事不知多用自己頭腦，一味做人家應聲虫所致。在若干年前，我曾看見胡先生對於某項問題大鬧笑話。這些年來我因埋頭研究某項專門學問，平時不大涉獵一般讀物，所以不知道胡先生的情況。可是前幾天偶一翻閱『理論與現實』復刊號，拜讀了胡先生的『論發展生產力』，又發見胡先生遇到實際問題就離開了唯物辯證法。

胡先生在文章的開端就揭出他的總綱領：要有和平與民主，中國的生產力才能得着解放，才能自由發展，因此他主張：『內戰必須堅決無條件的停止』，因為『內戰是破壞生產力的惡魔』。他說：『實現民主的最高意義就是打碎束縛生產力的惡魔，使生產力發展，使人民能够豐足，國家能够富強』。胡先生提出了這樣的綱領之後，七扯八拉的寫了幾千字把國民黨政府大罵特罵。國民黨政府當然是該罵的，我並沒有左袒國民黨政府的意思。問題是胡先生在痛罵國民黨政府的文章中沒有指示出生產力如何解放。胡先生不但在罵國民黨政府的文章中處處表示出他忘記了馬克斯主義，而且在一開端就把問題提錯了。

馬克斯談到『生產力』與『發展生產力』的時候，會拿它來和『和平』、『民主』並提過嗎？我雖淺學無識，未能多讀馬克斯的著作，但只憑我所曉得的馬克斯的基本學說，我敢斷言馬克斯決沒有這樣提過。馬克斯提到『發展生產力』總是與『生產關係』來並提的。馬克斯明言生產關係束縛生產力，阻礙生產力向前發展的時候，必須用革命的方法，摧殘舊的生產關係，才能為生產力開闢新的發展道路。所謂革命，當然是戰爭的一種，而且是國內戰爭的一種，可見得戰爭並不一定都是破壞生產力的，反過來說，和平也不一定都是發展生產力的。照馬克斯的觀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革命戰爭卻是解放生產力的必要條件，沒有革命戰爭，不但生產力無由發展，而且整個社會都將萎縮乃至滅亡。

既然革命戰爭是解放生產力的必要條件，那麼，說『實現民主的最高意義就是打碎束縛生產力的鎖鑰』也就毫無意義了。因為在革命戰爭中，只有階級的專政和階級的民主，沒有所謂一般的民主或抽象的民主。還因為這個原故，馬克斯、恩格思和列寧在任何時候也未曾把生產力與和平民主拉在一塊來談。也許胡先生的理論是馬克斯列寧主義之斯達林時代的發展吧。然而，希望和平民主能起解放生產力的作用，能

再論中國共產黨底革命觀

穆德

本期守敬先生來論，啓示了我去找『理論與現實』那期雜誌，去讀胡繩先生那篇『論發展生產力』文章。讀後，我覺得那篇文章是應當批評的，而守敬先生底批評，我也都同意的。守敬先生主要是把那篇文章當作胡繩先生底文章來批評，因之除了批評其中錯誤以外，還涉及胡繩先生個人對辯證法的理解和應用，以及過去所開笑話等等。我慚愧，以前未曾讀過胡繩先生著作，更不識胡繩先生為人，對於他個人方面事情不感興趣。我覺得他那篇文章底根本錯誤，并非他個人的錯誤，而是中國共產黨底錯誤，批評這些錯誤，儘可以把那個人事情擱開。而當作中國共產黨底錯誤來批評，則我要說以下幾點來補充守敬先生底批評，或與之相發明。

胡繩先生那篇文章比毛澤東底『新民主主義論』更加明白顯示中國共產黨底革命觀。從那篇文章看來，中國革命任務是在：（一）解放農民，（二）發展自由資本主義。達到這目的的手段，則是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政治上成立聯合政府，實行民主，經濟上工人和資本家合作或協調，農地和地主妥協。這些手段，無須經過暴力和戰爭，可以靠和平談判實行出來。須待過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實現之後，過了相當時期，讓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讓無產階級積累力量，然後談得上社會主義革命。這最後一點，那篇文章雖然沒有說，但據『新民主主義論』看來，這是題中應有之義，我們代為補上，胡繩先生不會否認吧？這個革命觀，在俄國大體是門雪維克派底革命觀。當初，門雪維克派也是認為俄國革命任務是在發展自由資本主義，農民解放本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上一個重要條件。他們也是主張無產階級與自由

「吃有穿，豐衣足食」，豈不正和美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所散佈的幻想一樣麼！

胡繩先生罵國民黨專政是中國貧窮災荒和生產不能發達的根源，當然沒有錯誤。但是怎樣才能消滅國民黨專政呢？是用革命手段迫得國民黨交出政權呢？還是用妥協手段請求國民黨開放政權呢？胡先生走的是第二條道路。他主張勞資協調勞資合作的原則，他主張聯合民族資本家來反對官僚資本家。

當資本主義還在向上發展階段的時候，馬克斯也沒有主張過勞資協調，而胡先生在資本主義已爛熟，資本主義矛盾發展到極點，資產階級叛向無產階級進攻的今日，却表示贊成勞資協調，我真不知道胡先生預備要叫勞工大眾如何協起。胡先生要勞資雙方讓步嗎，那麼，不償資本家非經鬥爭不會讓步，而且工人們的生活已苦到無步可讓。胡先生贊成強制仲裁方法迫得勞資雙方都讓步了，問題仍沒有解決。因為胡先生所提出的並不是一即在業工人的生活問題，而是整個解放生產力的問題。從解放生產力的觀點來說，則失業現象不消除，工廠停工現象不消除，一切人力物力得不着合理的使用而發揮其可能發揮的效率，則生產力並未得着解放。這些問題都不是勞資協調所能解決的。

把民族資本家和官僚資本家對立起來，更是大大的笑話。官僚資本就不是民族資本麼？這是那裏來的邏輯？也許胡先生要說官僚資本雖不是外國資本但是它依靠外國吧，其實所謂民族資本果真能不依靠外國麼？整個中國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已實質殖民地化了，民族資本那能不依靠外國？民族資本家和官僚資本家在依靠外國一點上只有間接與直接之分，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官僚資本家比民族資本家實力雄厚，且有政治力量的幫助，都無法與帝國主義的金融支配對抗，難道民族資本家能希望和帝國主義相對抗麼？中國民族資本家（本文中的『民族資本家』，都是照着胡繩先生原意的『民族資本家』，即不包括官僚資本家的民族資本家。）在經營上那個能脫離了外國的關係？他們用的機器是外國來的固不待說，就是原料，此刻也很多仰給於外國。那個產業資本家不兼做囤積生意，囤積大批的舶來品？他們周轉資金的時候雖非直接從洋大人手裏周轉，但他們能逃過胡先生所反對的與外國有關係的『官僚資本』的羅網嗎？其實一部分『民族資本家』所以反對『官僚資本』，正因為『官僚資本』壟斷了對外關係，他們反對這種壟斷，而希望自己能直接和外國金融資本發生關係，直接從外國獲得物資資本，直接從事對外貿易。

胡先生的意思，要發展中國生產力就必須幫助民族資本家反對官僚資本家，或者聯合民族資本家反對官僚資本家。姑毋論胡先生的希望，照胡先生的辦法能否實現，即使實現了，中國的生產力是否就就得着解放了呢？不會的，不會的。官僚資本固需仰賴外國金融資本，民族資本也需仰賴外國金融資本的。結果雖把寄生於中間的官僚資本排除了，並不能求得中國經濟的獨立，也不能求得中國生產力的解放。這情形正和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能排除寄生的商人，並不能解決社會根本矛盾是一樣的。

金融資本統治產業資本乃是資本主義的必然規律，而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金融統治與政治統治相結合也是必然的現象。中國金融資本雖因先天不足而採取了稍與西洋金融資本不同的發展途徑，成了外國金融資本的附庸，雖然由於中國的特殊情況而與政治發生高度的結合呈現為官僚資本的形態，但是

派資產階級聯盟，推送自由派資產階級走上政權，而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積累力量，伺西歐諸國無產階級一般，等到力量充實之後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所不同的，就在門雪維克派僅僅『現實』上與資產階級共組『聯合政府』和實行勞資協調，而『理論』上尚不敢如今日中國共產黨這般公開宣傳罷了。

門雪維克派當時居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們徵引馬克思底理論來替這種革命觀辯護。馬克思曾說：工業上較多發展的國家顯示較少發展的國家以後者未來的形態。他們由此推論說：俄國發展底模型是英法德諸先進國，這些國家既然是資產階級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執掌政權，發展資本主義，讓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底下漸漸積累力量，那麼俄國也祇能走這條道路。馬克思又曾說：一種社會形式未曾完全耗竭其可能性以前，是不會消滅的。他們也由此推論說：俄國資本主義尚在開始發展，離耗竭其可能性還遠得很，所以現在談不上甚麼社會主義革命。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把門雪維克派這個革命觀打得粉碎了。十月革命及其以後建立立的國家，在諸先進國歷史中并非前例可尋，而遠未耗竭其可能性的俄國資本主義已非退出舞台不可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馬克思底話說錯了麼？

馬克思並沒有說錯。先進國顯示落後國以未來發展形態的話，是有條件性的，有限制性的。歷史決不重覆。落後國雖可在先進國歷史中發現其若干發展形態，但也有自己的特性，為先進國所沒有的。落後愈速，則特性愈多。門雪維克派把馬克思這個有條件性的話轉變為絕對的超歷史的公式了。一種社會形式耗竭其可能性的話，則不應當在一國範圍內來瞭解，而且應當在世界範圍內來瞭解。俄國

它的金融資本的本質並不因此而改變的。胡先生不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而站在產業資本家的立場來反對這變態的金融資本家，不但要碰壁，而且是開倒車的。胡先生既未提到以革命的手段來沒收這部分官僚資本，而且從整篇文章的調子推測，他實是希望這部分官僚資本能從寄生性的投機資本變為生產性的產業資本。胡先生不了解在整個世界關係中，中國的金融資本已註定了只有走向投機而無法走向生產的運命。這正和中國的政治在全世界的關係中只有走向獨裁而無民主可能是一樣的。中國是全世界的矛盾的集結點之一，只有從世界革命的觀點才能解決中國問題。發展生產力問題也好，和平問題也好，民主問題也好，都必須從世界革命的觀點才能得着真正的解決。

三

我在上面所講的道理本極淺顯，胡繩先生當然不會不懂，可是以頂刮刮的馬克斯主義理論家聞名的胡繩先生，為什麼居然會弄出『和平民主』與『生產力』相連，明白主張『勞資協調』，要聯合民族資本家來反對官僚資本家這些笑話來呢？一切的災難都根源於胡繩先生不用自己的頭腦，遇事不深思，只知道道聽途達林的人民陣線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人民陣線和新民主主義的罪惡不限於它把革命領導到錯誤路上，使革命日漸失利，他更大的罪惡是在用似是而非的理論欺騙了廣大的革命青年放下了思想上的武器，偏要挂着唯物辯證法的幌子。這一個傾向決不限於胡繩先生一個人，而是領袖追隨者們的一致現象。不過胡繩先生『論發展生產力』那篇文章却為我們供給了在思想上投降的典型的例子，所以我特別提出來請自命為馬克斯主義者的人們反省。

為保衛我們的思想武器，以下再從方法論方面對胡繩先生的文章重作一番檢討。

戰爭破壞了無數的人力物力，戰爭使許多工業停頓，戰爭使許多生產事業從建設性的生產變為破壞性的生產，戰爭使交通阻塞，農村荒廢……從這些地方想來，『和平』的確似乎是發展『生產力』的必要條件，可是馬克斯為什麼不拿『和平』與『生產力』並提，反倒說只有革命戰爭才能解放生產力呢？難道馬克斯的意見錯了麼？不履高山，不見平地。不把真正馬克斯主義的見解提出，則胡繩先生的『和平』論調確實是最能獲得庸夫俗子們同意的。戰爭能破壞生產而和平能增加生產，的確是合乎眾人直接經驗的說法。可是由經驗得來的真理通常總是隨伴着很小的局限性，一超過這個限度就要失其效用。拿胡繩先生的見解和馬克斯的見解相比，很顯然的是胡繩先生的真理得自一時的表面的經驗，而馬克斯的真理則得自長期歷史的概觀和社會內部的分析。胡先生在這時候却完全忘記『唯物辯證法要求我們要在歷史發展中去認識事物，要在內在矛盾中去認識事物。』

胡繩先生隨着中共向國民黨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國民黨開放政權，組織聯合政府，主張聯合民族資本家以反對官僚資本家，來發展自由資本主義，他所根據的是『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在中國並沒有過時，不但沒有過時，而且還沒有真正開始』。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在中國果真沒有過時麼？國民黨果真會開放政權實行民主麼？在我看來，胡先生所希望的都未免要落空。胡先生所以有上面這些主張，不外是把中國從世界

資本主義雖然發展未久，但就世界範圍說，資本主義已經耗竭其可能性了。門雪維克派不懂得這點，所以陷於破產。

門雪維克主義在十月革命之中破產了，但革命以後若干年，隨着官僚反動底抬頭，門雪維克主義復活起來，表現得最明顯的是中國共產黨底理論。胡繩先生說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在中國不僅沒有過時，而且還沒有真正開始；他反對在中國批評自由資本主義；他規定發展自由資本主義為中國兩大任務之一。這一切表明甚麼呢？豈非表明胡繩先生同當初門雪維克派一般，認為中國資本主義還有很遠大的前途？但他不明白，資本主義既然在歐美已經爛熟了，在中國也就沒有發展前途了。不僅整個資本主義即將為社會主義所代替，而且自由資本主義早已為壟斷資本主義所代替了。在全世界如此，在中國亦然。胡繩先生為甚麼堅持中國非經過長期資本主義發展不可呢？豈非因為諸先進國都經過了長期資本主義發展，所以中國也必須經過長期資本主義發展麼？但他不明白，俄國已有特殊性，無須依照先進國形態去發展，中國更有特殊性，無須依照先進國形態去發展了。

接受了門雪維克派兩個錯誤前提之後，必然要做出門雪維克派結論的。於是『聯合政府』『勞資協調』『和平談判』等等就接踵而來了。這一切形成了中國共產黨整個的革命觀。

中國共產黨稱此革命觀為布爾雪維克的或列甫主義的。可是列甫底俄國革命觀，本質上與此不同。布爾雪維克派和門雪維克派同認俄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性質，但布爾雪維克派否認俄國資產階級有革命作用，而提出無產階級和農民聯盟來對抗門雪維克派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聯盟主張。列甫說：『正因爲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所以無產

關係中抽象出來，機械的和若干先進的國家的發展歷史對比而得的結論。中國的資本主義誠然未得着通暢的自由發展，但如果因此就以爲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在中國並未過時，却是非馬克斯主義的看法。從整個世界關係下來看中國，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在中國確已過時了。中國決不會再有什麼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也不會有什麼和平民主。中國可能有的前途只有兩種：如果革命能够勝利，則資本主義經濟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必然一開始就帶有若干社會主義的性質，如果革命不能勝利，在國民黨統治下，不管能否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國就只會日漸走向法西斯化的道路，也不會再有什麼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法西斯化是資本主義沒落期的一般傾向，何況中國是整個資本主義的矛盾集結點。胡繩先生在這裏又把唯物辯證法的重要定律忘記了，他不在全體關係中去認識部分，而要把中國問題當作中國問題來研究。在列甯時代已經說到少數金融融巨頭宰割世界，現在離列甯時代又已二三十年，美國不僅以經濟優越統治世界，甚至在世界各處佈置軍事根據地，準備獨霸全球，而我們的胡先生却仍要夢想中國問題能脫離外國影響讓我們獨自解決！

總之放棄唯物辯證法而採取經驗論就只有從革命家變成和平主義者，放棄唯物辯證法而採取機械論就被虛偽欺騙家們引得墮落到什麼程度！起來，爲保衛思想鬥爭的武器而戰！猛省，檢查我們自己是否仍緊緊抓住這思想鬥爭的武器！

讀者通信 青年人的兩大問題

編輯先生：

我是新旗的一個經常讀者，我認爲，這雜誌不單是一本政治性的鬥爭刊物，同時也在指導人走上一個全新的人生觀，因爲我正同上期通信裏那位言保貞先生一樣，讀了新旗之後，整個思想都受了影響。

我是鄉鎮小學裏的一個教員，雖然還只十九歲，但開始踏入社會，到今天已是四年了。在這四年中，做了一年典當學徒，六個月印刷生涯，又是一年多的繞莊練習生。爲了家貧，我不能進高中讀書，又因爲懶惰，找不到一個較合理的職業。環境打擊着我，我一直予以失望。

這時候我看到了新旗，她給了我很大的興奮，鼓勵，我覺得找到一條新路了。但想想這個迷大的前途，又想想我這個一無所長的人，沒有好好地讀書，沒有任何技能，我能於新社會有什麼貢獻嗎？想到這裏，我又茫然了，失望了。究竟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學些什麼？從事什麼職業才好？願先生有以教我。

宋醒石上 九月七日

醒石先生：

一個有志向的青年人沒有力量升學，本是痛苦的。我本人就受過這樣的痛苦。我當初的家庭情形也沒有力量供給我讀書的，我勉強讀畢了中學，更勉強地讀了一年大學，終於還是讀不下去了，中間是飽嘗苦痛的。可是後來我覺悟了，求學不一定靠學校的，生活是學校，整個社會就是學校，要讀書不一定進學校——

階級更加要反對資產階級。『列甯從來不主張『聯合政府』，而且竭力反對『聯合政府』，而且斷言無產階級代表人一般不可以加入資產階級政府；他從來不提倡『勞資協調』或『勞資合作』，而且從原則上反對『勞資合作』；他從來不散播能經過和平談判完成革命的幻想，而且努力攻擊這個幻想，努力說明暴力革命的幻想，而且說『他從來不說甚麼一般的民主，他祇說階級的民主。』

但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布爾雪維克派底革命觀還是不完全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未曾確定工人和農民間的關係。究竟是農民領導工人呢？工農平等關係呢？工人領導農民呢？三種關係不同，『工農民主專政』底性質和效果也將隨之不同。歷史證明，農民是沒有政治獨立性的。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列甯寫道：『農民不跟着無產階級走，便跟着資產階級走。』農民不能領導工人，工農不是平等關係。『工農專政』若是能實現的話，必然是『工人領導農民的專政』。但如此就等於『無產階級專政』了。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則革命必須走出民主的範圍以外而進入社會主義的階了。所以一九一七年革命當中，列甯看得更加清楚了，便拋棄了『工農民主專政』舊公式，而採取『無產階級專政』新公式，因之便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觀，而採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觀了。

胡繩先生也許要說：布爾雪維克派革命觀應用於俄國是對的，但不能應用於中國，因爲俄國不是殖民地，而中國是殖民地。

可是既然俄國革命觀一般不能應用於殖民地；胡繩先生爲甚麼能够把他的門羅維克派革命觀應用於中國呢？

從列甯主義觀點看來，資產階級不只在俄國帝國之下沒有革命性，她在殖民地帝國主義壓迫之下

從此我悲憤地離開了學校，毫不以失學而痛苦，同時我直到今天還在求學，還在讀書。

我希望你不要因為不能進學校求深造而感痛苦。

其次是職業問題。我個人從不曾找到過一個職業。一來是難找，二來也不願找。一個社會主義者是以謀得改善社會之實現為職業的。做社會主義者這本身就是一個職業。可是幹這個職業不一定就能吃飯。在一個弱小的學術性的或甚至行動性的團體裏，是不能供給很多人生活的，那末這些社會主義者如何生活呢？不得已，只好各人找一個副業幹。對於這個副業的選擇，在我們是極不重要的。無所謂高低，無所謂好壞，唯一的標準就是牠不是直接幫助統治的，同時最好，牠能給我們較多時間來幹我們的『正業』的。所以職業對於我們祇具有很小意義，祇爲了人不吃飯便不能生活，不

中國革命悲劇(續)

生活便不能談社會主義之故。其實這樣的職業態度，任何懷有較高理想或較遠情願的人，都不能不如此。固不但以社會主義者爲然的。大哲學家斯賓諾莎，是靠磨鏡片來維持生活的。

我希望你也能採取這樣的職業態度。如果你能打破庸俗的讀書與職業的見解，我想你一定會大大地樂觀起來，積極起來，勇敢起來。

小學教員這個職業很合於做社會主義者的副業，尤其在鄉鎮上，小學教員當是最進步的份子，因為他們是城市文明與農村羣衆的媒介，是鄉鎮的鄉鎮小市民的啓發者，希望你能安於這個職業。你們那裏的小教中，有多少像你那樣的愛智者呢？也許很少吧？但也不會沒有『芳草』的吧。

編者 九月十七日

共產黨黨員是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的，希望南方工人能接受共產主義影響，因爲此時南方工人已經依附於國民黨了。但共產黨提出在一種能獲得羣衆擁護的綱領上改組國民黨的建議，孫文則始終不理。直至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在廣州叛亂，孫文被迫又一次亡命之後，才漸漸聽從馬林底意見。孫文親信中最急進的廖仲凱也支持馬林底意見。孫文還是不信羣衆運動如此有力能成爲政治武器的，但他開始抱持能從俄國得到直接而具體援助之希望。

有多種因素配合起來促成孫文注意於聯俄可能性。他的國際共同開發中國之天真的計劃，遭受所有帝國主義政府之拒絕或推辭。羣衆不會聯合來哄騙綿羊的。狼與狼間祇能互相鬥爭，決定誰來吞噬綿羊。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召集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這個會議又激起了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恩惠之希望，但不久這希望就消失了。借汪兆銘底話來說：華盛頓會議「使中國不致受日本武力獨佔」，但祇爲的讓列強去「合作佔領」。這個會議不爲

也是沒有革命性的；農民不僅在俄國沒有政治獨立性，在殖民地也是沒有政治獨立性的；勞資合作不僅在俄國是錯誤的，在殖民地也是錯誤的；和平談判不僅在俄國不能代替暴力革命或戰爭，在殖民地也是不能代替暴力革命或戰爭的。

中國共產黨理論家們，請勿以中國是殖民地爲藉口，拿門雪維克主義來代替布爾雪維克主義。

門雪維克主義代替了布爾雪維克主義以後，理論家們（胡繩先生在內）自然要無視發展生產力上戰爭和專政底作用，而祇見到和平和民主底作用了；他們自然要不明白，發展生產力雖需要和平和民主，但要有真正和平和真正民主，必須先經過革命戰爭和革命專政了；他們自然要向地主和高利貸者『保障資本家』，要主張『工人也有義務加緊生產以保障資本家的合法利潤』了；他們自然要背誦辯證法公式時頭頭是道，但應用於具體的實際的問題時就笑話連天了。

Harold B. Isaacson
唐 威 譯

了中國民族解放利益而召集的，而是爲了美國帝國主義利益而召集的。人們明白了這個事實之後，對於列強惡意友誼之幻想就消失無存了。中國國民運動領袖們因此覺悟，蘇維埃新強國，居然能擊破世界大戰勝利國聯合的干涉，也許能够做一種有力的槓桿，利用來強逼帝國主義對中國讓步。

早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維埃政府就公布無準備放棄帝制俄國在中國享受的一切帝國主義特權。一九二〇年十月二七日，她又重申這個諾言。非正式的蘇維埃政府代表開始在北京努力談判，圖謀訂立一個新約在此基礎之上。懷敵意的列強一向是儘其可能從政治軍事各方面去孤立和破壞布爾雪維克政制，此時就來抵制蘇維埃代表們底努力，雖然蘇維埃政府是提議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訂約的。這個提議在中國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大大提高了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在中國知識分子羣衆中的威望。

蘇維埃代表們來中國聯絡，其開始的努力就已顯出一種傾向，即把蘇聯直

接的國家利益置於革命利益之上。這雖是一種孤立的事例，却頗令人注目的了。當赤塔政府和共產國際在伊爾庫茨克的辦事處第一次派遣非正式的代表來中國時候，北京政府是操在臭名洋溼的親日派安福系手裏的。孫文領導的微弱的國民運動，並沒有給予那些代表以一種印象，認為可以用來做蘇維埃國家利益底支點。代表們更多傾向於吳佩孚，一個有強大武力的軍閥，他正想推翻安福系政府。後來，一九二〇年，當吳佩孚在北京取得政權，設立了一個傀儡內閣時候，蘇維埃政府機關報『新聞報』遠東問題『專家』評論道：『吳佩孚已經把他的旗幟掛在北京城頭上了；顯然可見，在此旗幟之下，中國新內閣政權方向一定是有利於蘇維埃俄羅斯的。』(見一九二〇年十月九日莫斯科『新聞報』)但結果證明吳佩孚乃是英國帝國主義底工具，絕非布爾雪維克派俄羅斯底朋友。英國簡單代替日本做北京政府後台老關罷了。正爲這個原故，一九二一年的談判才沒有成功的。

馬林一九二一年春天來到中國，在廣西會見孫文，如此與孫文發生了聯繫。他於是有了印象，認為中國國民運動底主流是追隨孫文領導的國民黨的。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員罷工聲中，他來到廣州，發現國民黨和新興的中國勞動運動最活躍部分之間確有實質的聯繫，於是上述的印象就轉化爲確信了。伊爾庫茨克辦事處，乃是共產國際和遠東之間唯一的樞紐，此時馬林就違反這個辦事處過去的傾向，而來杭州向中國共產黨人提議加入國民黨了。一九二二年八月，孫文被人從廣州驅逐到上海來，馬林又會見他，勸他勿圖謀拿將軍車事手段去奪回廣州，而應當做羣衆宣傳工作。華盛頓會議也轉移國民黨領袖們底思想了，馬林發現他的主張得到更多的歡迎，因爲孫文已經確定想得蘇維埃援助了。一個月之後，馬林就回莫斯科報告去。根據他的報告，共產國際遂放棄了『伊爾庫茨克路線』而注意孫文。馬林提出的與中國南方運動合作的意見，公開發表於共產主義出版物上。(見一九二二年九月『共產國際』雜誌馬林寫的『中國南方國民黨革命運動』)蘇維埃政府於是派遣趙飛，牠的第一流外交人才，來中國，同孫文建立正式的聯繫。

趙飛在上海會見孫文，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兩人共同發表宣言，其中趙飛同意：『中國還沒有實行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之條件』，『中國主要的和迫切的任務乃是完成民族統一和民族獨立』。趙飛向孫文保證：國民運動在完成這些任務途中，是『可以仰賴俄國援助』的。這個外交辭令建立了孫俄協定，孫文終於明白：俄國人在是拿十月革命威權，連同軍火，金錢和顧問，奉獻給他和他的黨。

但同一外交辭令，立即又被人解釋說是：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盡其全力務使國民黨成爲值價的同盟者。同年秋天，鮑羅廷就來做孫文底顧問了。鮑羅廷不是以共產國際代表資格來幫助中國共產黨工作，他是以蘇聯共產黨底政治局派遣的國民黨顧問資格到中國來。這兩種資格決非祇有純形式的差別。鮑羅廷底使命是在改組國民黨，將新的生命注入於國民黨。一切的努力，尤其中國共產黨人員底努力，從此都應集中在這個使命上面。

共產黨底獨立的政治前途，於是被人置於腦後了。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已經決議：『當中國革命的工人階級運動還是很微弱的時候，當中國當前的中心任務還是實行國民革命以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封建走狗的時候，當工人階級還是未曾充分發展爲一種絕對獨立力量而又必須解決這個國民革命任務的時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國民黨和幼稚的中國共產黨必須互相協調其活動。』無產階級底獨立性被移置於不定的未來去了。但雖如此，中國共產黨仍不可與國民黨『合併』，仍不可『放下自己的旗幟』。在實踐上，倘若共產黨人必須爲了與國民黨協調活動這個『中心任務』而放棄了『絕對獨立力量』代表人底資格，那麼結果必然要喪失其自己的獨立性的。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壓抑了黨內反對派(反對加入國民黨)之後，便提出『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口號。大會宣言明說：『國民黨應爲國民革命中心力量，應站在領導地位。』

給共產黨人鋪設這樣一條道路，必然要引導他們走到這個思想，即認爲：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應先於國內階級間的鬥爭，或應暫時延緩國內階級鬥爭。利益相反的階級可以團結在一個政黨裏面，——這個觀念乃是建立在一種意見上面的，即認爲帝國主義壓迫能緩和各階級間利益對立而不會加深這個對立，資產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僅具有革命作用，而且具有領導作用。這是根本離開了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定下的戰略路線，因爲把國民運動疏導於資產階級民主孔道，而斷送共產黨底政治和組織獨立性了。從一九二三年起，中國共產黨就承認了國民黨底『領導地位』。共產國際亦然。共產國際爲了替這個錯誤路線辯護，便發展一種理論，說國民黨并非資產階級底黨，而是各階級爲反對外國侵略者的共同利益而團結起來的黨。這個理論起初成立於實踐中，不久就進入於共產國際底文件而指導其未來全部戰略過程了。

鮑羅廷說服孫文明白：國民黨需要的是有一個有紀律的黨組織，又有強力的羣衆組織爲其後盾。當十一月間，陳炯明又來威脅孫文所奪回的廣州時，鮑羅廷給了一個具體的事例，證明如何拿筆墨幾句語言就可以使得工人和農民起來

保衛國民黨政權。陳炯明底威權而易舉地被解除了，這事使鮑羅廷底談論得人信任。得到孫文支持，鮑羅廷於是起草一個綱領，以國民黨和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合作為基礎，包含反帝國主義鬥爭思想和改善農地地位計劃。鮑羅廷採取了孫文底「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口號，使之具體化，但祇限於規定二五減租和預許勞動法規範範圍內。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召集第一次全國大會，通過了這個新綱領，而且徹底改組了。大會開幕那日，列甯死去。這是一種歷史的偶合，其中不乏諷刺意義，因為蘇聯和共產國際，本是列甯領導創立的，現在正在中國拋棄無產階級絕對獨立性的觀念，拋棄列甯這項最有價值的遺產了。

從此，國民黨模擬了俄國布爾雪維克黨底組織形式，採取了布爾雪維克黨底宣傳鼓動方法。過去國民黨主要弱點之一，是依賴那些封建性的軍閥，為袖救這個弱點，俄國人遂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創立黃埔軍官學校，為培養新的國民革命軍軍官之用。軍校底配備和經費，都是俄國供給的。以前好久，蘇維埃軍火就一船一船裝到廣州來裝備那些依附於新旗幟下的軍隊了，這些軍隊於國民黨表現其力量之後不久就依附過來，而國民黨力量又是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所賦予的。

國民黨現在開始迅速發展了，共產黨人為了符合他們在國民黨內工作的要求，便限制自己於資產階級國民革命底口號和要求，而這些口號和要求自然是受中國資產階級利益所限制的。共產黨底幹部，起初主要是從學生羣中出來的，後來從熱練工人出來的也漸漸增加，他們都是在純粹資產階級國民革命意義下受教育，而非在無產階級革命意義下受教育。這事使得共產黨變成了國民黨底一種左方附屬品。

區別共產黨員和「純粹」國民黨黨員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和孫文主義中間其深刻的思想分歧，並不是綱領上甚麼差異，因為整個運動都是在孫文底三民主義旗幟之下進行的。共產黨員和上層國民黨黨員間的區別，就在於唯有共產黨員賦予國民黨及國民運動以英勇精神，以自我犧牲，以共產主義的進取心，這是從他們對於農工的熱忱產生出來的，他們自信是替工農利益服務。共產黨員未曾提出任何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未會拿自己的面目和旗幟出現於羣衆前。他們是孜孜不倦地拿組織和羣衆鐵流灌進國民黨模型裏去的。可是，在起初幾個階段，這個事實底真正意義部分地被羣衆運動底龐大發展所遮掩了。羣衆運動并非共產黨底策略或國民黨底要求所製造的，其興起的條件實已存在於中國社會機構中了，如同鑽石存在於礦山中一般。

在廣州，上海，漢口，天津，及其他大城市，外國人和中國人購辦的工廠中，工人底勞動和生活條件還在同產業革命初期英國工人條件一般。男工，女工和童工，同那時英國工人一般，也是每日勞動十二小時，十四小時，十六小時的，所得工資一天還不到八分美金，他們的安全又無最初步的保障，他們的醫藥又是最微小的供給。一種可惡的學徒制度供給小廠主和小店主以取之不竭的兒童勞動，學生們每日勞動至十八小時和二十小時，只換來幾碗飯和一块睡眠的地方。在如此勞動條件之下，雇主，尤其外國雇主，用其優越的技術，自然可以榨取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值，因為勞動者底生命是很不值錢的，中國人底死亡率又沒有人知道。產業發展之後，工人數量增加了，為反對這些條件，他們就挺身而起。

有組織的勞動運動，大戰之後立即出現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運動以前，就有工人罷工發生；一九二〇年，廣州機器工會發動第一次大規模的罷工；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員以其罷工使英國帝國主義屈服，承認工會合法和增加不少工資，這事震動了全中國。從此建立了基礎，而工人紛紛加入工會。一九二二年五月，在海員勝利的領導之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開會於廣州。大會代表表示了二十三萬有組織的工人。在這強大的新力量壓迫之下，孫文底廣東政府就修改刑法，承認工會組織為合法，而替往後的發展清除道路了。（未完）

* 故世的沃塞·蘭參 (Arthur Ransoone) 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寫的『中國之說』中，曾將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概括為如下的話，即說：『俄國教國民黨』如何將孫文底改良工人生活之綱領轉變為有力的攻守武器。鮑羅廷教了孫文不要信賴自己，而要信賴一個黨以後，一定會教孫文不要信賴個人，而要信賴階級。鮑羅廷一定會說明俄國工人如何實行一九〇五年革命，……而便宜了俄國資產階級，說明法國土地革命如何打擊封建貴族，……而便宜了法國資產階級。……這些是危險的武器，但沒有其他武器能達到所期的效果。實際使用這些武器時，最適宜的工具就是中國共產黨人。中國革命如果到了不需要這些武器時候，共產黨人就要遭受最重大打擊了。』

一九二四年，孫文圖謀調和共產主義和他的學說，便說共產主義便是民生主義。如此說法遂使他的信徒糊塗，遂使他的學說難懂。但他究竟是忠實於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原則的。關於孫文思想發展的研究，請看 H. C. Carter 著的『廣州莫斯科協定對於孫文政治哲學的影響』，在一九三四年北平出版的『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中。

三星期前，我們公司接線部，曾發生了一次怠工潮。起因是由於一個女接線員工作時屁股還坐着一張報紙，給監督發見了，如以斥責。女接線員否認有錯過，因為屁股並沒有眼睛可以看見，並不妨礙她的工作。當監督追問報紙來源時候，旁邊另「接線員吳某，看不過眼，出來辯駁。監督老羞成怒，一紙報告，第二天便把這個插嘴的接線員開除了。於是羣情激奮，認為這點小事不足以任意開除工人，大家起來要求收回成命並以怠工示意。

這件事情一直拖延到今天還沒有解決。經過情形是這樣的：當怠工發生後，工會立即出來指責工人不應未通過工會便自行怠工，但爲了使羣衆對牠有好感起見，願出面與公司交涉，工會的代代表告訴我們：此事可以由他們負責，只要我們立即復工。我們覺得事情亦無擴大，工會能叫公司恢復被開除者的職務，未嘗不好，我們就先復工。

工會與公司交涉的結果，據說我們的要來已得到美國大班答應，不過復職後調到另一部門而已。但當我們剛剛認爲滿意而要求必須立即實行時候，這「口頭答應變卦了，五個部長聯名主張非開除吳某不可，否則，他們五人便要總辭職。真奇怪！一個小小的接線員何以會突然使這些大亨如此之重視？這是偶然的麼？當然不是。我們都明白：資方現在正企圖向我們進攻，牠顯然在計劃怎樣削弱我們的力量。牠們必認爲彼開除者曾經替工人說過話，是不利於牠們，是眼中釘，因此非除掉不可。接線部長所宣布吳某的罪狀（如「在工作時間唱歌，隨便談話」等）也不過是一種藉口而已。

在資方的心目中，最好每個工人都成爲牠的忠實奴隸，死心塌地替牠賺錢，然而，天下豈有此理，我們同樣要吃飯，穿衣和養家，我們活不下去時，就應有權利爭取我們所需要的，我們一年到底爲公司辛苦，出力，賺錢，照理，資方也應隨時提高我們的待遇，但牠反而心懷詭計，藉口任意開除工人，打擊工人，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資方現正以拖的辦法對付我們，在他們看來把時間拖長了，這件事情便可自我們的心中淡忘了，便集不攜一致的熱情爲此事再起來與之爭鬥，然後，順利地，照樣一個個把較自覺的工人踢掉，於是可以得心應手了！可以坐獲更大的利潤了！我們必須當心呀！必須團結來對付他們的陰謀詭計。

我們爲了要求被開除者立即復職，爲了我們今後的職業不致毫無保障，爲了反對資方的陰謀進攻，我們應該繼續鬥爭，靠自己的團結力量。工會的主持者，表面似乎同情我們，替我們出力，但誰敢說牠不是敷衍我們，誰敢說牠不在與資方妥協？昨天（四日），工會開的代表大會，雖然爲了專門討論我們這件事情，但竟議而不決，還叫我們再等待社會局的調解，評判委員會的評判，光是這一點已經說明工會並沒有從工人方面着想，不管牠說得怎樣的漂亮。

我們這次局部的鬥爭，在表面看來似乎只爲了一個人，不爲人們多大注意，其實，並不簡單爲了個人的開除與復職，是有關乎整個工人今後的鬥爭的。牠替我們指出一點值得注意的事：公司當局正以各種可能配合整個資本家對工人的進攻，最好的

辦法便是首先削弱我們的力量，把他們認爲有害的人排除出去，使我們的團結鬆懈。勞資可以合作麼？這簡直是騙人！這次鬥爭又一次證明：任人們以拍馬屁式的勞資合作說去逢迎資本家吧，但資本家討厭地一脚踢開以後，還要去扼工人的咽喉呢！

我們必須反對資方的有意拖延不決，否則我們便會中資方的詭計。我們要使我們的要求能够達到，除了經常保持我們的熱情與團結外，還必須立即取得各部門工友的同情與援助，更重要的，必須立即完全拋棄勞資合作的念頭，而代之以階級鬥爭。

編者底話

本期出版恰逢辛亥革命紀念日。我們不願意寫夜景的文章。我們便以沒有夜景的文章，來紀念牠。

「再論內戰擴大以後」文中說上海至今未開李開追悼會。此文寫時固未開，但本期出版前六日開過了，是在雙方「君子協定」之下開的。開後，有人說，此次追悼會堪爲中國未來聯合政府之模範，因爲雙方合作得很好；有人說，一方固然是追悼死者，他方則是貓哭老鼠。我們追悼的文章在第五期。此時此地何話可說？我們也就不再寫追悼文章了。

*

「收回滬九問題」一文，不會讀的人將以爲我們反對收回滬九。好像輿論反對清奔團不打老虎，祇打蒼蠅，不會讀的人也將以爲輿論主張勿打蒼蠅。